

金城银行的兴衰沉浮（中）

■ 王丹莉 王曙光

作为民族金融业的中坚，金城银行自肇创至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的二十年中，获得了空前的扩张。这一时期也是民族金融业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然而在1937年至1949年之间，金城银行也和其他私营银行一样，进入了一个坎坷曲折的发展时期，既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之压迫与欺凌，又受到国内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盘剥与排挤，可谓在夹缝中生存。在这一时期，金城银行在掌舵者周作民的引领下，在艰苦卓绝的内外环境中求发展，一方面通过各种经营活动保存实力，并与各种政治力量展开周旋以拓展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亦努力通过金融活动继续支持本国工商业的发展，勉力维持其业务规模，在这十几年中仍然保持着国内私营银行界首屈一指的地位。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初，金城

银行为庆祝建立20周年，出版了《金城银行创立二十周年纪念刊》，强调金城银行遵循服务社会之宗旨并根据时势而灵活应变的经营策略：“历年业务方针，自以创立之旨趣为基准，惟为适应时代之需求，不能不随宜酌采相当之方策”，“以银行既为社会机关之一……立志期成其焉社会事业”，“以辅助国民经济之发展为职志”。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的1941年，周作民发表《本行廿四周年纪念日感言》，强调“本行于创立之初，即以服务社会公众为职志，凡所经营，辄视其公益性之为何如，力求有裨于生产建设”（《金声》第23期，1941年6月15日）。自然，在抗战时期极为艰苦困厄的大环境中，金城银行要想“不改初心”，继续服务社会大众、扶助工商企业，自会遭遇各种困难。抗战初期，原本金融业非常繁盛的上海，其金融中心地

位有所跌落，金城银行在全国性的谋划布局中，也开始将战略中心向后方转移，开拓西南、西北地区市场。金城银行1939年作的一份调查中说：“全国金融向以上海为领导，战后不仅贸易额惨落，各种押款亦无从料理，金融业殊感出路困难，同时政府西移之后，贸易重心移转西南，于是西南各省之金融事业，顿觉繁盛”（《金城银行史料》，684页）。金城银行战后在西北、西南广设分支机构，自1938年在昆明、贵阳、重庆三地增设分支机构以来，金城银行在西北、西南等后方共设置分支机构二十三处，“大凡后方较大之城市，无不有金城机构之设立”（《金城银行史料》，689页），1941年4月又在重庆成立管辖行，统辖西南、西北各行处，与上海总处划分资金实行独立核算。抗战之后金城银行在全国布局上的扩张，对于金城银行

奥西里斯作为丰饶之神及复活之神，他的形象具有双面性，干旱时死去，丰水时重生。他头戴象征上埃及的白色王冠，王冠周围插满了红色羽毛。他的皮肤为绿色，代表着植物——他在做国王时教会了埃及人民耕作。

奥西里斯神话有不少版本，细节也有许多差异，但主干故事则是大致相同。虽然他是冥界之神，但他并不是魔鬼或黑暗之神；相反，他象征着埃及人所相信的死后可以永世荣耀的希望。所以，一般在壁画中，若脸上涂有绿色的颜料，则表示在复活中或已经复活。埃及不少地方有与奥西里斯相关的神庙，因为他是人民最喜爱的神，也最受崇拜。

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古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其原型与古埃及的奥西里斯神话存在着关联。奥西里斯虽是冥神，

也是农神。每年的干旱被视为他的死亡，而每年尼罗河的泛滥及谷类的生长则象征着他的重生，他掌控着每年尼罗河的水情。奥西里斯在天庭还有一项工作，这就是酿酒，并将葡萄酒与生命的血液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有一种说法认为，古希腊的狄奥尼索斯的原型来自于古埃及。也因此，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上了奥西里斯。

神话虽然是前文字时代的产物，却是文明的滥觞。神话也是一种历史，这是学者们的共识，比如特洛伊遗址的发掘，就是德国学者谢里曼根据古希腊神话特别是《荷马史诗》中的描述及线索找到并发掘出来的。□

（作者为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兼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存放款业务的拓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当时金城银行在国统区的大量分支机构投资的大小企业达40多个,包括钢铁、煤矿、化工、航运、贸易等各产业,对于后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周作民在抗战时期仍旧对范旭东创办的永利化学公司、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实业公司(交通运输业)竭力扶助,表现了极高的胆识与魄力。当然,这种经营格局上的拓展,也适应了抗战时期国内经济局势的巨大变化,使金城银行能够在战时的复杂环境中,一方面在沦陷区厚集资金,套购外汇与黄金,一方面在后方大量搜购与囤积物资,并通过投机获得大量的经济利益。这是金城银行在抗战的特殊时期获得“畸形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当时的民族金融业在复杂的经营形势下不得不作出的无奈的战略抉择。

客观来说,金城银行在抗战时期巨额通货膨胀下既有损失的一面,也有获利的一面。从损失的一面来说,战前它贷给国民党政府的铁路放款、政府机关放款和购置的公债库券,数量庞大,这些放款大部分付诸东流,国民党政府基本未归还,金城银行购置的公债在战后物价上涨数千万倍时却被政府仅以票面价格清偿,实际上与掠夺抢劫无异;但是从获利的一面来说,随着货币贬值,金城银行庞大的存款折合黄金的数量急剧下降(1937年全部存款折合黄金1393520两,而1945年只折合1554两),金城银行只需极少的黄金就可以把全部存款清偿,这无异于对广大储户的一次巨大的剥夺。就如《金城银行史料》的编者所说:“通货膨胀中发生的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最深重的剥削与掠夺,金城同其他几家大型私营银行一样,总

的来说,也从中得到了分润”。这个评价是非常精当和客观的。

抗战之后,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打击之下,在官僚资本银行的挤压之下,私营银行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实力逐步萎缩。1937年抗战刚开始的时候,金城银行的存款总额为15900万元,折合黄金139万两,到1948年12月,存款总额只有4154万元,折合黄金仅剩1万两;1937年6月,金城银行存款占国家资本银行存款的6.52%,到1948年6月,这个比例急剧降低到0.61%。国民政府控制的“四行二局一库”(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对金融的垄断进一步挤压了私营银行的发展空间。1948年8月,为搜刮国民财富,国民政府废止法币,发行金圆券,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同时限期收兑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金城银行遂将近200万美分外汇资产造具表册,呈报中央银行。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政策10个月即告崩溃,国民党政权随之亦灰飞烟灭。在此期间,周作民本人遭受蒋经国胁迫,要求其交出个人所持外汇,其人身安全亦受到威胁。金城银行亦被迫申报外汇资产,并在政府勒令下现金增资(实际上是政府逼迫银行交出黄金与美钞),金城银行陷入危局。1948年12月8日,金城银行设立行务讨论委员会,期待在“时局动荡时期”“集思广益”,度过危机;1949年5月为“适应非常环境、敏捷处理行务”,复成立行务讨论执行委员会,周作民等在香港给金城银行总处写信称:“值此环境,本行业务停顿,同人生计维艰,益以战云密布,人心恐慌,引颈北望,忧心如焚”(《金城银行史料》895页),

反映了周作民此时彷徨忧虑的真实心境。

在金城银行业务基础已经被国民党政府摧残殆尽而陷入危境,国民政府即将倒塌之际,周作民与爱国民主人士李济深多有往来。1948年李济深北上来京,周与李仍有书信往还,并与李相约于1950年3月自香港返回内地,后因周作民健康状况不佳而未能实现。上海解放初期,金城银行在上海的业务遭遇危机,上海总经理徐国懋北上请求人民银行支援,人民政府为维护金融稳定和私营银行发展,给予大力扶持,这个举动令周作民深受感召。周作民终于从怀疑观望犹豫不决,最终决定返回,1950年8月由香港经天津、北京,返回上海。周作民是金融界头面人物中第一个从香港回来的。他在北京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与李济深、黄炎培、章士钊等老友相见,并作为全国政协会议特邀代表列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周作民的举动,对全国私营银行界以至于全国工商界领袖人物影响甚大。随着周作民的北归,金城银行的命运也由此转机。根据徐国懋的回忆,解放初期人民政府为帮助金城银行解决债务问题,曾收购金城和中南二银行共同投资的新裕纱厂的一个工厂,潘汉年曾经让时任上海财政局局长的顾准见周作民,说明政府愿意支持金城,对于周的任何要价均照数接受,这使周作民深受感动(全国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编《回忆周作民与金城银行》)。这一切,都促成了周作民的转变。□

(王丹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曙光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